

20世紀上半葉聖言會(SVD) 在山東編纂的三部漢德詞典

李雪濤*

本文以歷史為線索，對20世紀上半葉德國傳教士漢學家商格理(Joseph Stangier)、薛田資(Georg Maria Stenz)以及岳立仞(Otto Jörgens)神父所編纂的三部漢語-德語辭典的歷史、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辭典本身的特點進行了簡要的描述，並從辭典學的角度，對這三部辭典進行了評述。由於傳教士常年在中國生活、工作，他們的漢語知識主要來源於與中國人交往的語言實踐，因此他們所編的漢外辭典往往能很好地用外語說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特點，同時也為我們今天研究漢語提供了重要的活生生的語言史料。正因為如此，這些詞典在漢學史、文化交流史以及漢語研究史上的價值都是有待挖掘的。

與漢語-拉丁語辭典以及漢語-其它老牌殖民國家語言的辭典的歷史相比，漢語-德語辭典的編纂則起步較晚，這與德國作為民族國家一直到1871年才真正成立有着直接的關係。雙語辭典較晚地編纂也有好處，其中之一便是可以參考在他們之前編寫完成的漢語和其它歐洲語言的雙語辭典。20世紀上半葉編纂的漢語-德語的辭典除了具有一般的語言辭典的特點外，在前言或附錄中也對漢語本身從語音、詞匯以及語法方面作了細緻的描述，為我們瞭解漢語在當時的形態提供了珍貴的文獻史料。在德國來華傳教的修會中，“聖言會”(SVD - Societas Verbi Divini)是非常重視教育的，1875年愛諾德·楊生(Arnold Janssen, 1837-1909)神父曾在中學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多年，他“不僅強調對宗教的熱忱和神學思想，更注重在原始和陌生國家從事科學工作，即是以科學和實際的方法解決問題，學習用地質學和考古學方法，研究當地文化、語言和傳統等”。⁽¹⁾因此，

以德國的學術研究當地的語言和文化是符合楊生的創會精神的。實際上，早在1882年到了山東之後，就着手開辦許多教會學校，1900年前後在濟寧、兗州、青島曾創辦中德中學校。1933年“聖言會”接管了之前由“美國本篤會”(American Benedictines)創辦並經營的北京公教大學(輔仁大學，英文名為：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²⁾正由於“聖言會”對教育的重視，早期的雙語字典和漢語教科書大都出自這一修會的神父漢學家之手。⁽³⁾

儘管從當代雙語辭典學的視角來考察這些辭典，會發現它們中的很多問題和不足，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些辭典卻為我們提供了漢語發展變化的軌跡以及當時社會生活的狀況。在漢語發展變化方面，我們可以從中認識到這些辭典編纂者對中國文化和語言的認知方式和程度，並且可以考察詞匯的變化和淘汰規律。由於傳教的需要，早期的傳教士除了重視漢語書面語之外，同

* 李雪濤，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漢學》副主編。

時也很重視口語。商格理編纂的《華德字典》出版於1914年，在1919年白話文運動之前。實際上，基督宗教在傳教活動中(包括創辦報刊雜誌、撰寫傳道小說、編纂口語辭典)所進行的話語實踐對中國現代白話的誕生產生過很重要的影響。

早期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等在編纂雙語辭典時祇能運用自身語言的語法知識、單語字典的編纂方法來進行，可以說完全是開創性的先驅者工作。進入20世紀之後，在中國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辭典如《新字典》(1912)、《辭源》(1915)等，同時也出版了重要的漢英辭典如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⁴⁾(1931)，這些辭典為上述三部漢德辭典的部分或修訂版奠定了基礎。

一、**P. Jos. Stangier** (商格理) *S.V.D.*, *Chinesisch-Deutsches Taschen-Wörterbuch* 華德字典, Tsingtau: Druck u. Verlag der kath. Mission. 1914.

這是漢德辭典中較早的一部，是由聖言會的神父商格理(Joseph Stangier, 1872-1953)編著的，後在青島的天主教傳教會的出版社出版印刷。實際上，依據辭典的德文名稱(*Chinesisch-Deutsches Taschen-Wörterbuch*)，這部辭典的名字應當是“袖珍華德字典”。辭典前言寫於1914年5月15日費縣(Feehian)。費縣位於魯東南，蒙山南麓，屬於兗州教區(1882年成立魯南代牧區)，聖言會的神父華德勝(Alfred Kaschel, 1876-1955)⁽⁵⁾曾在此建成一座修道院。商格理的序很可能寫於這座修道院中。

在前言中編者提到，幾年前在兗州府的天主教出版社出版了部頭比較大的《德漢辭典》(*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但《漢德辭典》一直未能出版，編者的這一工作便是要消除這一缺憾。書中提供了共約4000漢字及其以此為基礎的漢語詞匯的德文解釋。這部辭典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德國人學習漢語之用，同時也照顧到中國人學習德語的需要。在辭典中，所有的

漢字發音都用斜體標出，作者認為這對中國人也會很有幫助。由於當時中國字典中還是使用反切的方式注音，也就是說用兩個字來註另一個字的音，當然沒有直接用字母注音來得直接。為了讓當時的使用者儘快掌握這套系統，編者在正文之前按照字母順序編了一個相當於今天字典中的“音節表”，除了按順序排列的音節外，每個音節後邊還附上了一個最常用的漢字，漢字右邊的頁碼是在正文中的位置。⁽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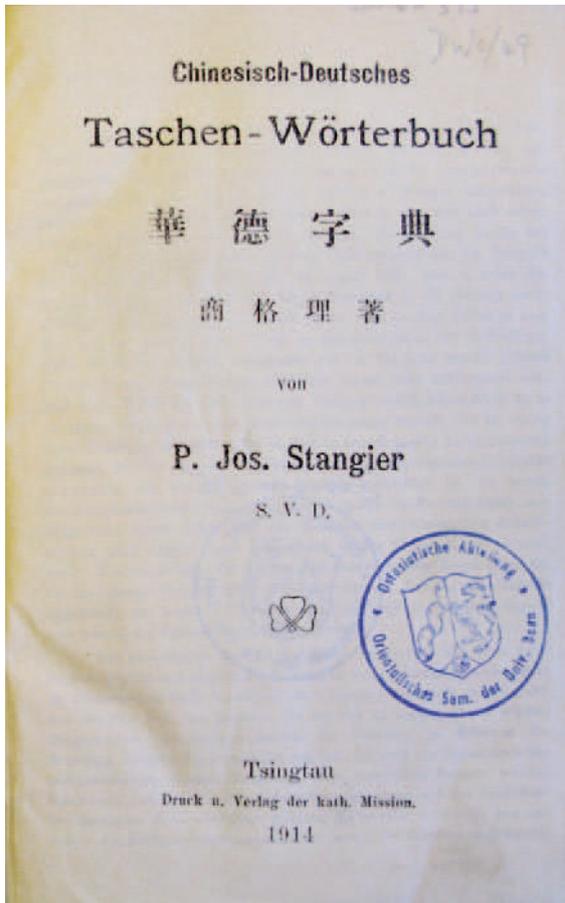
這部辭典的母本是1904年法國傳教士P. A. Debesse的《漢法字彙簡編》(1906年的第2版為：*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par le P. A. Debesse, S. J. Deuxième édition.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06.該辭典共計521頁)。除此之外，編者還列舉了八本參考書：

- 1) Giles englische Ausgabe 2 Bd.
- 2) Couvreur S. J., lateinische Ausgabe, 河間府
- 3) Couvreur, franz-sische Ausgabe, 河間府
- 4) Dsi dse ben,⁽⁷⁾ 河間府
- 5)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兗州府
- 6) Dictionaire Phonétique Chinois-Français, 北京
- 7) R. Wilhelm, die wichtigsten chin. Zeichen,⁽⁸⁾ 青島
- 8) U fang yüan yin, chinesische Ausgabe.⁽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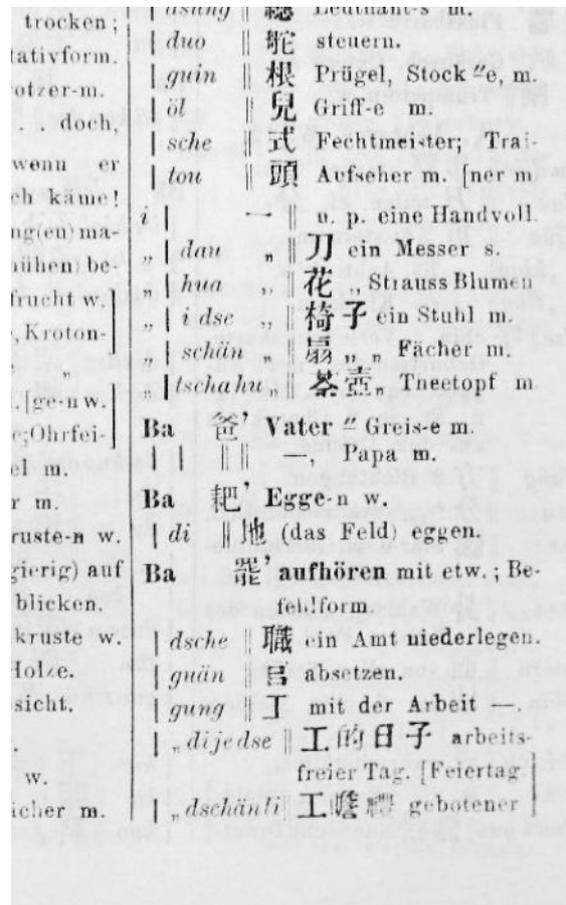
實際上，當時在中國出版的漢外辭典還是有一些的，祇不過今天已經很難見到了。

辭典正文共560頁，是按照漢字發音的音序排列的，基本上是採取“以字帶詞”的編排方式，分為單字條目和多字條目：單字條目起着統領的作用，其發音用比較大的字體排出，而中德文字體與多字條目相同，多字條目按第一字分列於統領的單字條目之下。為了避免重複，字頭下的同一漢字用“丨”而其發音用“|”來代替。

漢語裡的很多口語詞匯和固定搭配在中文辭書中常常不被收入，而在這部辭典中都被收入了，對於德語作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辭典正文的編排方式以“巴”為例，如下：



商格理辭典扉頁



商格理辭典正文書影

Ba, 巴 *anhafte*n; trocken; Schlag. m; Optativform.

- | | |
|-------------|--|
| dee | 得 Schmarotzer - m. |
| bu ,, | 不 ,, o dass .. doch, |
| ,, ,, ta lä | ,, ,, 他來 wenn er doch käme! |
| djä | 結 Aunstrengung(en) machen, sich (bemühen) bewerben um. |
| dou | 豆 Tiglibohne, Krotonfrucht w. |
| ,, schuang | ,, 霜 entölte ,, |
| ,, yu | ,, 油 Krotonöl. |
| dschang | 掌 Handfläche; Ohrfeige -n w. |
| dschuän | 磚 Dachziegel m. |
| gao di | 高的 Streber m. |
| gän | 幹 trocken; Kruste-n w. |
| yän di | 眼 的 fest(gierig) auf etw. blicken. |

在“巴”字的字條下，從形式方面來看，編者選取了十一個例詞，其中前九個是按照詞的首字音序排列的，後兩個詞中第一個屬於逆序而第二個則是“巴”字在中間的。也就是說，這部辭典實際上是以中心詞的方式排列的。這樣的排列方式是非常有利於非母語者學習漢語的。

從這十一個例詞來講，其中包括：詞(“巴豆”、“巴掌”)、詞組(“巴不得”、“眼巴巴的”)以及句子(“巴不得他來”)，這樣的選擇有點像今天的語言學習辭典，儘管從選詞的科學性來講可能不是很嚴格，但對於學習者來講，卻是很實用的。

在內容方面，除了一般的漢語詞外，還收錄了一個外來詞(這類詞對於漢語作為非母語者很難分辨)：“巴巴得”。這個詞今天已經不用了

(連《漢語大辭典》中也沒有收錄此詞)，不過從德文的釋義可以知道它很可能是“寄生蟲”(英文：parasite)一詞的音譯。

從現代漢語的選詞方面來看，“巴磚”、“巴高的”兩個詞今天也已經不用了。查《漢語大辭典》，亦未收錄這兩個詞。筆者估計這兩個詞是聖言會傳教的地區——魯南的方言詞。

在德語的釋義方面，“巴結”被解釋為“努力；勤奮”的含義，而沒有“奉承、討好”的解釋。由於是傳教士編的漢德辭典，其中特別重視宗教的詞匯，如：“拜”字條下就有“拜聖體”、“拜聖像”兩個詞條。辭典中有一些德語釋義不是很準確，如“罷工的日子”被解釋稱：arbeitsfreier Tag。這個解釋的意思是：不必工作的日子。實際上漢語的詞義是：為了實現某種要求而集體停止工作的日子，跟德文中的“Streiktag”更接近。

辭典的第二部分是漢字部首檢字表，能從部首和筆劃，檢索到字典正文中大約5000漢字的詞條。這對於查找那些不知道發音的漢字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為了中國人學習德語的方便，還附上了德語動詞不規則變化表。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動詞的排列上，編者首先給出的是這些德語動詞的漢譯。由於是單個的動詞，有些漢語解釋是當時的口語或方言，如：bergen 的漢譯為“救”（“求”的異體字，現在已經幾乎見不到了）。將bleichen 解釋為“曬亮，落色”也是有些問題的，因為這個德文詞的原意是：漂白、褪色的意思。當然在“布料在陽光下變淡”(Der Stoff bleicht in der Sonne.)一句也會用到這個詞，但其本身沒有所謂“曬亮”的意思。再如 dringen 解釋為：催逼(催逼)，這兩個通假字今天已經很少用到了。從編者所給出的這些動詞的漢譯，也可以看得出當時的現代漢語的詞匯並沒有固定下來。

附錄部分還有：中西時間對照表(中國傳統地支計時與西方小時對照表)以及天干地支紀年表、二十四節氣、漢語數字寫法、214個部首等。其中

中西時間單位的對照表，對當時的德國人瞭解中國傳統的計時方式，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編者編寫這部辭典的1914年距離使用公元紀年和西方計時方式僅有兩年，大量的中國文獻都還是使用傳統的紀年和計時方式，這樣的對照表在那個時代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二、P. G. M. Stenz (薛田資) S.V.D., *Chines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華德字典, Druck und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Yenchowfu. 1928. (Zweite umgearbeitete und stark vermehrte Auflage, 842 Seiten)

薛田資神父(P. Georg Maria Stenz, 1869-1928)⁽¹⁰⁾ 1893年來中國山東傳教，後因教案受傷後被送往國外。1904年重新回到山東後在濟寧的“中西中學”(Franz-Xavier-College)任校監，後於1928年在美國去世。除了這本《華德字典》外，他對魯南的風土人情頗有研究，這方面的專著有《在孔子的故國：山東概述》(*I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 Skizzen, Bilder und Erlebnisse aus Schantung*. 1902)以及《魯南民間故事集》(*Beiträge zur Volkskunde Sud-Schantung*, 1907, A. Conrady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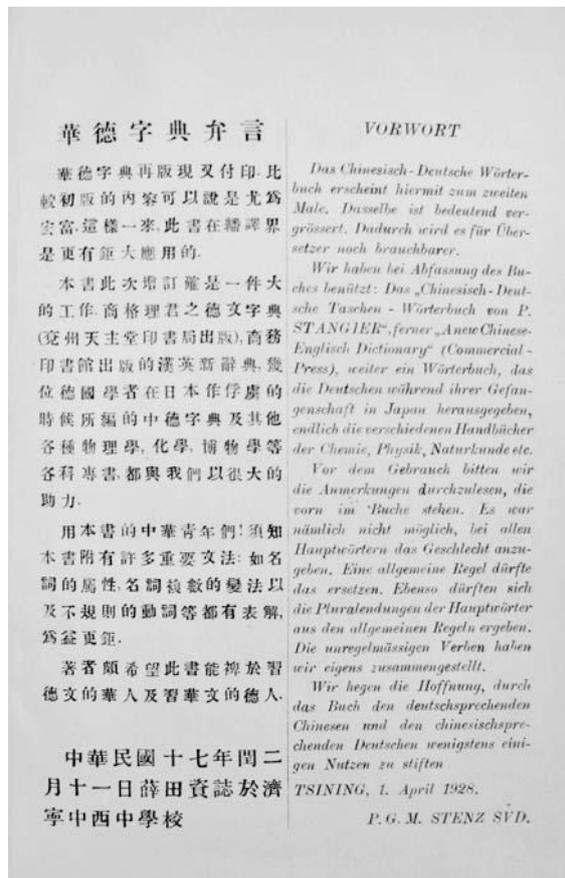
這部《華德字典》是由設在兗州的聖保祿印書館出版的，該印書館是在1900年前後從濟寧遷往兗州的，由德國聖言會創辦。筆者在波恩大學所見到的這本薛田資的辭典是1928年的修訂版，係德國日本學家特勞茨(Friedrich Maximilian Trautz, 1877-1954) 1930年的藏書，在書的扉頁上印有他的藏書章——篆書的：都莫宇津之印。⁽¹¹⁾特勞茨去世之前，將他大部分的有價值藏書贈送給了波恩和科隆大學的日本學系，⁽¹²⁾筆者推測，其中的一部分重要中文工具書被轉到了漢學系的圖書館。

辭典前有中德文對照的“華德字典弁言”，其中提到了在增訂的過程中參考了一下新出版的基本雙語辭典：

1) 商格理君之《德文字典》(兗州天主堂印書局出版)(P. Stangier, *Chinesisch-Deutsches Taschen-Wörterbuch*)



薛田資辭典扉頁



薛田資辭典弁言

2) 商務印書館《漢英新辭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mercial-Press)

3) 幾位德國學者在日本作戰俘時編的《中德字典》及其它各種物理學、化學、博物學等各科專業書籍。

在談到這部書的編撰目的時，薛田資認為，這部辭典首先是為了中國年輕人學習德文用，其次才為德國人學習漢語着想：“著者頗希望此書能裨於習德文的華人及習華文的德人。”⁽¹³⁾這跟他作為設在濟寧的中西中學(Franz-Xavier-College, 今濟寧一中的前身)校監不無關係。在“弁言”的中德文落款處，分別作：“中華民國十七年閏二月十一日薛田資志於濟寧中西中學校”和“Tsining, 1. April 1928. P. G. M. Stenz SVD.”可以看得出來，為了符合雙方的習慣，薛田資分別用了農曆和西曆。

辭典正文是按照漢字部首和筆劃的順序排列的。辭典前有“部首檢查表”(部首檢字表)，將214個部首按照筆劃數排列。有意思的是，編者在部首的右邊註明了發音。有些發音記載了當時魯南的方言，如“二”的發音註為“öi”。

辭典正文共842頁，跟Stangier的辭典類似，薛田資在辭典中也收錄了很多的口語詞，同時每一單字下面的詞匯也是以中心詞的方式給出的。以“齡”(第842頁左欄)為例：

齡 Ling, Schneidezahn m; Alter s

|| 年 das Alter

口齡 Aussprache w

齡歲 Alter s; Lebensjahr, Altersjahre pl

|| 壽 das Alter

首先，在注音方面，僅在單子後面給出了發音，但並沒有給出相應的音調。而在德文的釋義中卻給出了詞性(Genus)，從中可以知道，這本辭典的讀者對象應當是包括他的學生在內的學習德語的中國人。

口語的詞匯在這本辭典中非常多，如“一”下就有：“一巴掌”、“一袋煙”、“一道閃電”、“一點不錯”(均為第1頁)等這些在今天的現代漢語辭典中根本不可能收入的詞匯或句子。

由於這部辭典特別是為了中國人學習德語編寫的，辭典中也附有〈德語規程攝要〉。在〈攝要〉中，編者將德語的名詞分為“陽類”(陽性)、“陰類”(陰性)以及“總類”(中性)三個部分。同時附有“剛變言變法表”(強變化動詞表)，分為“現在時”、“方過時”(過去時)、“旁說”(間接引語)、“命說”(命令時)以及“全過時”(完成時)強變化動詞的變化情況，跟今天的德漢辭典中的附錄沒有甚麼區別。在〈剛變言變法表〉的最後一欄，編者同樣給出了每一個動詞的中文翻譯，很多的翻譯是跟商格理神父辭典相同的，同時也去掉了一些特別不常用的異體和通假字。如商格理辭典中對bergen的解釋為“救”，而薛田資更通俗地解釋為“隱，保全，拯救”；而在商格理辭典中對dringen的解釋：“催逼”，在薛田資的辭典中則解釋為：“催逼，突入”。從中可以看出，十多年後現代漢語的詞匯愈來愈趨於規範。

三、P. Otto Jörgens S.V.D., *Chinesisch-Deutsches Taschen-Wörterbuch* 華德辭典, Tsingtao: Druck und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Tsingtao, 1941.⁽¹⁴⁾

作為聖言會的岳立仞(Otto Jörgens, 1879-1946)，在1906年被祝聖為司鐸後即到了山東。先後任職於兗州修道院、戴家莊師範學校，1935年到青島湛山，直到1946年去世。岳立仞在山東期間除了這一部《華德辭典》外，還出版了《心理學綱領》(*Psychologia*, 1925)、《算術》(*Institutiones Arithmeticae, in usum discipulorum et magistrorum*)兩種教科書，是由聖言會創辦、設在兗州的聖保

祿印書館印行的。⁽¹⁵⁾《華德辭典》的前言便是1941年寫於青島湛山(Tsingtao, Chanshan)。

從辭典的扉頁來看，本書是在商格理《華德字典》的基礎上修訂的，而本書的封面僅署有岳立仞的名字。岳立仞在前言中稱，在外部結構上此次修訂版跟1914年版本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修訂本增加了二十七年間中文中出現的很多新的表達方式，使用了標準的“國語”，還參考了以下的中文語言及百科知識類辭典或雙語辭書：

其中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書有：

- 1)《標準語大辭典》
- 2)《王雲五大辭典》
- 3)《學生辭典》
- 4)《哲學辭典》
- 5)《國語辭典》第一冊

中華書局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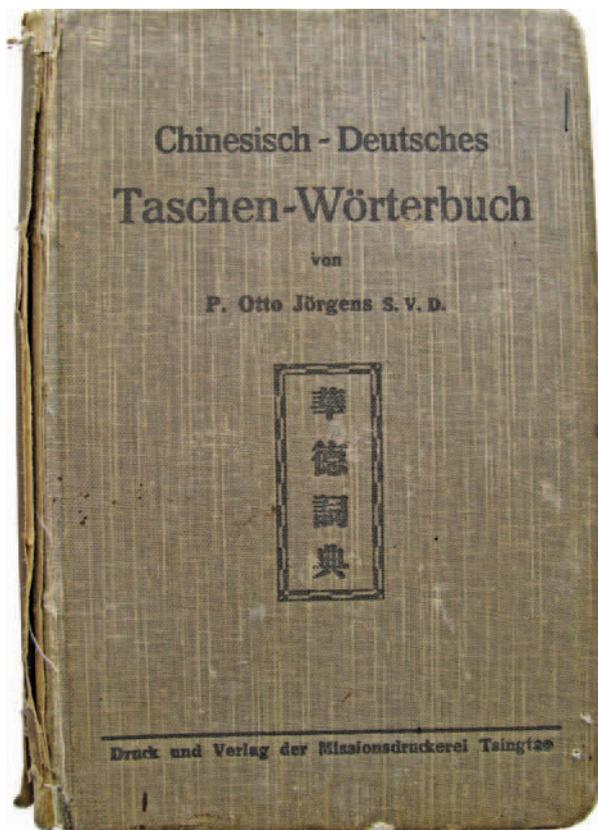
- 1)《中華成語辭典》
- 2)《辭海》

雙語辭典有：

- 1) *Chines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Rüdberg 2. Auflage*
- 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 H. Mathews*
- 3) *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örterbuch 2. Auflage Yenchowfu*
- 4)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2. Auflage Commercial Press*

由此可見，對於雙語辭典編纂來講，跟二十幾年前的商格理比較，岳立仞此時既有相對固定的現代漢語詞條供他選擇，同時也可以參考比較成熟的外漢、漢外辭典。

修訂版的正文824頁，在原有560頁的基礎上增加了近50%的篇幅。修訂版跟第一版比較，更加明確了讀者對象。傅吾康在書評中指出：“新版《華德辭典》以便於實用於目標，所選擇的材料均以此目標為依歸，並且全部都是採用白話詞語及通俗實用的文言詞語，把這樣巨大的材料安



邱立仞辭典書影



邱立仞辭典扉頁

置於這樣袖珍式的三十二開本書中，實在不是一件易事，應用既方便而材料又豐富，為了說中國話和讀中國白話文章的德國人及為了一些初學者們，這本辭典在與此目標相同的諸辭典中可佔第一位。”⁽¹⁶⁾ 限於篇幅的原因，第一版中有很多供中國人學習德語的資料，比如每一個德語名詞之後，分別用 m 註明陽性，w 註明陰性，s 註明中性。有些名詞還註出了附屬第一個的形式：“芭 Palme -n w.” (第1頁左欄) 表明該詞複數形式為：Palmen，陰性。在修訂版中以上的標註全部被去掉，因此，修訂版的讀者對象完全是學習漢語的德國人，不再兼顧到學德語的中國人了。

在版式方面，與第一版最大的不同是將頁碼放置在了每一頁的外下腳，頁眉上註出了發音 (包括用數字標註的調號) 和本頁所收錄的漢字，讓使用者一目了然。在新版中，每一個漢字除了

給出拼音和調號外，還特別給出了部首以及這一字的異體字及其部首。與第一版相同，修訂版每一頁也分為兩欄，為了便於檢索，編者對每一個收錄的詞從左到右都作了編號。在書後的“部首檢字表”中，有個別的字在辭典正文中沒有單獨給出，而是以詞的一部分出現的，如“抖擻”的“擻”字，在檢字表中(第836頁第4欄)的標註為“擻 121”¹⁸，所表示的是：第121頁第18行的詞。在相應的地方是“抖”字條：|²'sou³ | 擻 aufrütteln; (ab)schütteln.

在註音方面跟第一版最大的不同，是除了使用一套相對準確的德文註音系統外，對每一個字的發音都加上了音調。同時為了使學習漢語的德國人能夠掌握“註音字母”，在每一個單獨的漢字發音後面都標註了註音字母。這套註音系統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佈之後，曾經非常流

行，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佈之前幾乎所有的字辭典都在使用。因此學會這套注音系統，對使用中文的工具書是很有益處的。每條都用德式拼音字母註了音。祇不過所註的音是以山東音為主的北方音，祇是在標註*時，也給出了國語的注音。如：“國”字下：Guee (《 ㄨ ㄝ) 國¹(*guo²)⁽¹⁷⁾：如果改用漢語拼音來標註的話，山東話的“國”字讀：guī，而國語讀作：guó。在發音說明中，編者特別說明了山東音與國語發音的區別，例如：ai在北京音中發開口的/ai/如德文單詞Kaiser中的“ai”，而在山東音中卻發/ä/的音；在北京音中ö的發音如在Götter中的“ö”，而在山東方言中，是發ä和ö之間的音。編者特別指出，儘管很多的時候山東方言和北京音的標音是相同的，但兩者間還是有區別的。正如傅吾康在書評中所指出的一樣，編者並不是祇用了山東音，如“台”字就用了國語的發音“Tai”（第617頁右欄）而不是山東音“Tä”，“特別對於一個學中國國語的初學者（因國語為外國人學中國語之標準言語），是易於引他們入於迷亂誤會之中的。”⁽¹⁸⁾由於標音不固定，這也使得使用者有時要試着猜幾次才能讀音找到要找的字詞。

在釋義方面，編者將基本的義項用粗體標出，並區分“書面語”(S=Schrift)和“口語”(U=Umgangssprache)。再以“巴”字為例，來實際看一下這部字典的編排和釋義：

Ba (ㄅ ㄚ)

巴¹ **Wunschform**, hoffen; trockene Kruste im Topf; Handfläche; Backe; Name

| bá¹ | 巴 eingetrocknet (fest); begierig, verlangend

⁵ | 'ba⁽³⁾djiä¹djiä¹ | 巴結結 so gut es geht; wie es eben kommt

| bá¹öldi⁽⁴⁾ | 巴兒的 eigens

| 'bu⁽¹⁾dée¹ | 不得 daß doch!

| '., néng² | 不能 möchte, wenn doch! Ich wünschte, daß...

| 'deng⁽³⁾yä'n³öl | 瞪⁴眼兒 mit d. Augen zwinkern (nichts zu sagen wissen)

¹⁰ | 'djiä⁽³⁾ | 結¹ sich ernstlich mühen; schmeicheln

| 'djiä⁽³⁾bu⁽¹⁾scháng⁴ | 結¹不上 sich vergeblich mühen; keine Anerkennung finden

| 'dou⁽³⁾ | 豆⁴ Krontonbohne

| 'dou⁽³⁾yú² | 豆⁴油 Krontonöl

| 'dschang³ | 掌 Handfläche

¹⁵ | dschuán¹ | 磚 flache viereckige (Dach) Ziegel

| 'dschuo⁽³⁾ | 着² hoffen, wünschen

| 'dse⁽³⁾ | 子 vagina

| gáu luang⁴scháng⁴ | 高望上 verlangen voranzukommen

| guén⁴dse⁽³⁾ | 棍子 Stock

²⁰ | 'sche⁽⁴⁾siau²ti³ | 氏小³體 Pacinische Körperchen

| 'siang³ | 想 wünschen, verlangen

| 'uang⁽³⁾ | 望 erwarten, erhoffen

嘴dsuee³ | , 眼yän³ | | , 焦dsiau¹ | | , 幹gan¹ | | , 尾uee³ |

“巴”字詞條除了對單字條目做了解釋外，還對十九個屬於正序的多字條目進行了釋義，羅列五個逆序多字條目的互見，跟第一版比較起來，數量上增加了一倍多。在詞條的安排上，增加了一些常用的詞匯，如“巴着”、“巴望”，以及俗語如“巴瞪眼兒”，同時也增加了如“巴高望上”這樣的書面用語（《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王熙鳳在與邢夫人的對話用到的）。也有當時比較新的百科詞匯，如“巴氏小體”（英文為：Pacinian body），這是意大利解剖學家帕西尼(Filippo Pacini, 1812-1883)所發現的感覺神經末梢一種層狀囊包，現在稱作“帕西尼體”或“環層小體”。今天，連百科性質的《辭海》也不再收錄此詞了。此外還有個別不知出處的詞匯，如“巴子”的德文解釋

為“陰道”，不過查包括《漢語大辭典》在內的漢語辭典，均未有此義項。《漢語大辭典》“巴子”第二義項的解釋為“粘結塊狀的東西”，也許是從這個義項發展而來的。

“巴結”一詞在商格理的辭典中僅被解釋為“努力；勤奮”，而在岳立仞的辭典中除了被解釋為“努力”之外，第二個義項被解釋為“奉承、討好”。可以看得出，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詞的詞義在不斷變化。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趨炎附勢，極力奉承”變成了第一義項，而“努力；勤奮”僅作為〈方〉(方言)的一個詞匯被保留。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漢語詞匯在語義方面的變化。

在註音方面，除了相同的單字及拼音用“|”替代之外，編者還對每一個漢字都用德式拼音註了音。除了註音之外，本辭典還標出了變調，如“巴巴結結”中的第二個“巴”在山東方言中一般變為第三聲而成為“bǎ”。此外，對每一個詞的重音做了標註，這是筆者在同類辭典中第一次見到的。儘管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完整的音節，但構成詞後，特別是在句子中，每一個詞都有重度的音節(一般是第一個音節)。編者在詞條中，用“’”標註了詞的重音。

從所收錄的詞匯和解釋來看，這部辭典也反映了天主教的世界觀。以“天”字條為例，收錄了“天主”、“天主降生”、“天主教”、“天主經”、“天主子”、“天主父”、“天主聖三”、“天主神”、“天主性”、“天主堂”、“天父”、“天國”、“天堂”(第653-654頁)等十三個與天主教相關的詞匯。而在解釋“天”字的時候，一個義項特別指出是“異教的神”(Gott [heidn.]，第653頁)。而在“盤古”一條中，德文的解釋是“第一個人”(d. erste Mensch，第504頁)，因為在天主教的世界觀中，祇有天主(上帝)才能創造世界。這位在中國歷史傳說中被認為是開天闢地的人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使混沌的宇宙變成了今天的樣子，他的身體變成了宇宙萬物，其精靈魂魄在他死後變成了人類。

由於開天闢地的傳說跟上帝創造世界的說法相衝突，辭典的編者顯然故意省略了這一部分，僅說明了盤古是第一個人。

此部辭典的外部信息包括：正文前有前言(I-II)、凡例說明(III-VI)、音節表(按德式拼音順序排列的漢字音節，VII-IX)；正文後有約6000漢字的部首檢字表(214個部首，825-857)、十八個省的名稱及簡稱(858)、二十四節氣及公曆對照表(859)、地支計時與現代計時對照表(860)、十二生肖與年代對照表(861)、數字的寫法(862)、部首一覽表(863)。

結 論

一般說來，語文辭典可以分為“學習用辭典”、“參考用辭典”和“研究用辭典”三類，上述的三部雙語辭典可以歸入“學習用辭典”的範疇。而雙語辭典跟母語學習者的辭典又不一樣，許多對母語使用者來說不成問題的語言現象，非母語學習者總是需要有明確的規則可以遵循。其中所收的詞以當時常用詞為主，釋義先列常見的詞義，次列不常見的詞義；着重說明詞的用法、搭配以及語境語域描寫的標準化。因為，如果要正確使用詞匯，不僅要知道其義，還應當瞭解與這個詞相關的語法知識。

一直到薛田資《華德字典》的第二版，還主要是以經驗的方式來編寫漢德雙語辭典，亦即為調辭典的編纂實踐，這包括詞項的選擇、立目、釋義，亦即各類信息的組織和編排等。這從編者的序言中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到。由於岳立仞的《華德辭典》編纂時間較晚，他可以借鑒中國國內的漢語辭典以及多種外漢、漢外雙語辭典，因此在他的辭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編者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以何種方式來修訂這部辭典的，並且選詞的範圍也超出了純語文的條目。因此，岳立仞的《華德辭典》可以認為是“參考用辭典”，因為除了基本的詞匯外，也收錄了通用的、專科的以及百科知識方面的詞匯。從對20世紀上半葉聖言會傳教

士漢學家這三部辭典的考察，可以看出漢德雙語辭典編撰從個人經驗型到研究型的發展。

馬建忠認為：“字無定義，故無定類。而欲知其類，當知上下文之文意何如耳。”⁽¹⁹⁾因此一直到《現代漢語詞典》第四版(1996年修訂本)對詞條都不標註詞性，祇能讓使用者從詞句中去體會。2005年《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才第一次給詞條標註了十二類詞性。實際上，在漢外辭典中，通過譯詞已經可以看出許多漢語詞條的詞類了。如在岳立仞的《華德辭典》中，“翻譯”一詞被翻譯為“übersetzen”(第323頁，第21條)，編者顯然祇把此詞看作了動詞。而在現代漢語中，“翻譯”一詞實際上還可以作為名詞，表示“做翻譯工作的人”(《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第374頁右欄)。再如“困難”一詞既可作名詞又可作形容詞，《華德辭典》的解釋為“schwierig, mit Schwierigkeiten verbunden; Bedrängnis”(第402頁，第26條)，分別為形容詞(詞組)和名詞，與《現代漢語詞典》中所列的兩個詞性是相符的(第五版，第801頁右欄)。

辭典中的前兩部中文名被稱作“字典”而後一部則稱作“辭典”，這一變化可以說明人們對“字”和“詞”(辭)的認識的不斷深入。在古代漢語中，字(單音詞)佔據了絕大多數，所以古人習慣上把字當作書寫單位，也當作語言單位，不加分別。在古代漢語中，一個音節常常是一個漢字，一個語素，一個詞。也就是說，古代漢語中的“字”相當於英文中的“word”，因此古漢語“字典”就是現代漢語的“辭典”了。實際上，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出版後，“字典”一詞便流行起來。不過白話運動以來，特別是1924年黎錦熙(1890-1978)的《新著國語文法》出版之後，“字”和“詞”已經有了不同的分工，開始用“詞”來指稱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語文辭書的發展也漸趨成熟。⁽²⁰⁾據考訂，“詞典”(辭典)一名係日人借用漢字對英語單詞“dictionary”的翻譯，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的。⁽²¹⁾

語言在語音、語義、詞匯以及語法幾個方面的變化常常在短時間段內是看不出來的，放在一個長時段中就特別明顯。因此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特別提出“共時”(synchronic)和“歷時”(diachronic)研究兩個概念，以區別是研究語言的現狀還是歷史。實際上，即使是記錄當代語言的辭典，也必然有歷時性的詞匯。當然，辭典最重要的功能是記錄語言，亦即盡可能地對客觀存在的詞匯加以記錄與描述。這三部在上個世紀上半葉編寫的漢德辭典的詞條無疑為我們今天研究漢語提供了重要的活生生的語言史料。美國當代語言學家路德維希(Richard R. Lodwig)便認為，辭典的功用是盡可能多地收錄活的語言，而不是所謂最好的語言。⁽²²⁾聖言會的這三部漢德辭典儘管都有一定的指導思想，但編者主要還是“因需而編”，是比較典型的描寫主義(Descriptivism)的辭典。

跟同時代的國內的語文辭典比較的話，可以看得出這三部辭典都突出了檢索性功能。從檢索方法上看，商格理的《華德字典》和岳立仞的《華德辭典》是按照德式的漢字拼音首字的字母順序排列的(直接檢字法)，由於是漢德口語辭典，使用者一般能夠讀準要查的詞。辭典後附有“部首檢字表”，跟今天的大部分漢外雙語辭典以及漢語辭典基本上沒有區別。而薛田資的《華德字典》基本上是為了中國學生學習德文作文時用的，因此是按照部首檢字的方式(間接檢字法)編排的，並且在每一個詞條後面都沒有給出發音來，因為在這些雙語辭典中所收錄的漢字對於中國人來講並沒有甚麼真正的難字。遺憾的是，這三部辭典都沒有收錄相關的例句。

這些常年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傳教士漢學家，他們的漢語知識得之於在中國的閱讀以及與中國人交往的語言實踐。因此他們所編的漢外辭典往往能很好地用外語說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特點，而在這方面儘管中國學者能比較深刻地理解這些詞匯，但在用外語表達方面跟傳教士漢學家比較起來依然有所欠缺。筆者認為，正因為如

此，這些辭典在漢學史、文化交流史以及漢語研究史上的價值還是有待挖掘的。

【註】

- (1) (2) 柯博識 (Jac Kuepers) 著《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頁56；頁55以下。
- (3) 傅吾康在〈評袖珍式《華德辭典》新編本〉一文中指出：“聖言會在今日溝通中德文化關係的諸多前導者們中，無疑地是要佔一席地的。而且在現今諸多困難的環境下，該會還能使這本辭典照常出版，確實使從事溝通中德文化工作的中德人士們要表示十分感謝的。”《中德學志》第四卷(1942)，頁541。
- (4)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y R. H. Mathews,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1.
- (5) 請參考：雷立柏 (Leopold Leeb) 編：《在華SVD傳教士列傳》(*Biographies of SVDs in China, 1879-1955*), ad usum internum tantum (內部使用)，無出版年代，頁74。
- (6) 這一方式後來在《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中都得到了保留。
- (7) 《字詞本》，可惜今天已經見不到了。
- (8) 據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的阿梅龍 (Iwo Amelung) 教授稱，他那裡有衛禮賢這本《最重要的漢字詞匯表》的影印本。不過筆者一直沒有見到。
- (9) 《五方元音》樊騰鳳(1601-1664)所編撰的這部漢語字典在清代和民初曾盛行一時。
- (10) Stephan Puhl, *Georg M. Stenz SVD (1869-1928): Chinamissiona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Republik (mit einem Nachwort von R. G. Tiedemann / London: Der Missionspolitische Kontext in Sud-Shantung am Vorabend des Boxeraufstands in Chin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 (11) 感謝華東師範大學的劉正教授幫筆者辨別了“都莫字津”四個漢字。這四個字按照現代日語的發音可以唸成“と/ろ う/う/つ”，按照稍早的讀音為“と/ら う/う/つ”，這兩種寫法均由五個音節構成(其中第二個和第三個音節是一個字)，不管選第一種還是第二種，都應當是“Trautz”的音譯。感謝筆者的學生金澤凱在日語發音方面的幫助。
- (12) 請參考：Hartmut Walravens, “Friedrich Maximilian Trautz (1877-1954). Eine Bibliographie zu Leben und Werk”. In: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80. S. 286-311.
- (13) 在1935年由 P. Matthias Hermanns SVD 編著的《漢族文明進化史。卷一：中國的起源》(*Vom Urmenschen zur Hochkultur. Chinas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1. Bd.: Chinas Ursprung*. Missionsdruckerei Yenchowfu, Shantung, 1935) 的封面勒口處有薛田資的這本辭典的廣告，簡單翻譯如下：“《華德字典》，薛田資神父編。同樣也是按照214個部首編排的。包括很多合成詞和常用的短語。特別關注自然學科的領域。不過僅給出了每一個字的讀音，詞的讀音沒有給出。這部辭典對說德語的中國人來講很有幫助，同時也對有基礎的德國人學漢語會大有益處。在1928年版本的基礎上重又修訂並增加了很多詞匯。19+842頁。半精裝7元，全精裝8元。”
- (14) 當時在北平的中德學會任職的德國漢學家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在《中德學志》第四卷上(1942年，頁538-541)對這部辭典進行了評論。
- (15) 請參考上揭雷立柏 (Leopold Leeb) 編：《在華SVD傳教士列傳》，頁72。雷立波在書中將 Otto Jörgens 的中文名字誤植為：丘立仞。
- (16) 傅吾康：〈評袖珍式《華德辭典》新編本〉，《中德學志》第四卷(1942)，頁538。此文也收錄於胡巖吟譯編《困難時期(一九三三至一九四四年)德國學術論文選譯》，香港：和記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頁78-81。
- (17) 《華德辭典》，第86頁右欄。
- (18) 見上揭傅吾康：〈評袖珍式《華德辭典》新編本〉，第頁540。
- (19) 馬建忠著，章錫琛校註《馬氏文通校註》，中華書局，1954年，頁9。
- (20) 請參考：孫劍藝、董秀梅〈論辭典與詞典的區分——一個辭書學的基本問題〉，《辭書研究》，2001年第1期，第頁62-70，此處請參考第64頁。
- (21) 出處同上，請參考第65-66頁。
- (22) Richard R. Lodwig and Eugene F. Barrett, *Words, Words, Words: Vocabularies and Dictionaries*. NJ: Hayden Book Co, 1973, pp. 161.